



慰

Die Trostfrauen

安

妇

Ruth Hallo

[德] 鲁特·哈罗 著 赵兴辰 译

一段尘封的历史,唤起一段不能被遗忘的浩劫。

“写作这本书是为了抵抗遗忘”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慰 安 妇

Die Trostfrauen

[德] 鲁特·哈罗 著 赵兴辰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慰安妇/(德)哈罗著;赵兴辰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327-6959-9

I. ①慰… II. ①哈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

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2366号

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:

Author: Ruth Halo

Title: Die Trostfrauen

© 2012 by LangenMüller in der F. A. Herbig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, München

www.herbig.net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4-816号

慰安妇

[德]鲁特·哈罗 著 赵兴辰 译

责任编辑/杨懿晶 装帧设计/胡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94,000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3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959-9/I·4212

定价: 2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7602918

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幸存的“慰安妇”

法庭上

几小时过去了。对面墙上的大钟耐心地走着。指针似是从容不迫，缓缓挪动，但它仍在走着。

我心想，耐心点，你的时刻已经来了。正义很快就会降临，指针就在向着那一刻直直走去。今天，判决就要落定。最坏的都过去了，昔日种种终将归于宁静。也许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忘掉了。漫长的审讯已经结束。刚开始的时候我着实对它心怀畏惧，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能熬过来。

早晨去往东京地方裁判所的路途对我而言仿佛无穷无尽。尽管我们住的酒店离东京市中心不太远，然而要穿过一条条熙熙攘攘的街道却让那段车程显得尤其漫长。我坐在出租车里，两股思想在内心纠缠：一边是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正义，另一边则只想离开。后一种想法锁住了我的双眼，把窗外的街道和忙碌的行人遮蔽起来。司机突然用日语对我说话，吓了我一跳。再次听到这门语言几乎无疑是种痛苦，我只求马上远离这个让我憎恶的地方。窗外是花园里的樱花树，枝上开满了异常美丽的花，好看极了。我们慢慢穿过一片

粉色和白色樱花的海洋，穿过这座冷酷的城市里依稀尚存的美景。难道这片土地也值得拥有如此美丽的花吗？

我的内心深处沉浸在黑暗里，不见任何一丝闪烁的光芒，唯余丁点火花似的希望仍在燃烧。

外面温暖如春，我却感到寒冷。启程之前和平跟我说，只需要带些轻便的东西就够了，东京不会冷的。和平说得没错，但我还是颤抖起来。要是我们现在在家该多好啊，我想回中国，回到我们在南京的那个小房子。想象中，我看见自己坐在靠窗的沙发上，和平给我端来一杯茶。她真是个好女孩，安安静静地照顾着我，如同降临到我生命中的礼物。

长安挽着丽莎，和高教授、蓝玫一起在裁判所大楼前等候我们。高教授是个好人，没有他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。他衣着得体，还打了一条领带。丽莎微笑着，对我表示鼓励。

当初，丽莎在我看来只不过是“外国人”，是我们中国人说的“高鼻子”。在那之前我没见过几个欧洲人，看见她也有和中国人一样深黑的头发总感到惊奇。她笑着对我说，只有很少数的欧洲人是金发的。后来她和蓝玫成了朋友。

蓝玫的母亲曾是与共患难的姐妹——今天她已经无法出现在这里了。我们现在是少数人，却比从前要坚强许多。我们必须坚强起来，否则一切牺牲和付出都将是徒劳。我的目光落在长安身上，

她紧紧抓着丽莎的手臂。有个念头一瞬间在我脑中闪过，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溺水者。她看起来跟我一样很不舒服，面容如此苍白，显得异常瘦小和脆弱。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也像长安那样，以一副特别怯懦的形象展示在众目之下。可是，今天，我们是不允许显露出任何一点软弱的。

我跟着和平走进楼里，这是座庞大的建筑物，冰冷的石头仿佛一直伸向天空。我们踏进口大厅，身处其中，显得我们十分矮小。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朝我们走来，他是日本人，却友好地用中文与我们打招呼。他脸上是虚伪且不由衷的微笑。总之我看到的就是这样。裁判所委托这位年轻人作为我们的翻译。他带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29号厅，指了指我们的座位。又是一道栅栏！我只意识到这一点。但凡我遇到日本人的时候总会有栅栏。我现在又成了他们的囚犯吗？隔离栏后面的长椅上坐着许多记者，一走进去记者们就开始对着我们拍照。我不由得低下了头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

和平和丽莎坐在我旁边，长安、蓝玫和高教授则在后排。长椅上还坐着其他几位妇人，法院相信我认识其中几个人。

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惊到了我。翻译给了我们一个暗示，“全体都要起立！”他低声说。我们听从了。法官席伫立在一片宽阔的基座上，基座后方那扇厚重黝黑的大门打开了，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走了进来。他穿了黑色的长大衣和日本法官制服。“立见法

官”，高教授对我们低声说。立见在裁判席我们的左手边落座，其他人依次坐在其他位置上，然后我们才被允许坐下。

我不会说日语，但有时候我也能明白几句。多年的囚禁生活让我多少学到了那么一点，然而，今天，如果不依赖翻译我却一句都听不懂了。

法庭审理即将开始。我们是原告——六位中国女性。被告是日本政府，由酒井冈本律师代理辩护。起诉书如下：在此出庭的来自南京的林美安、白长安女士，来自上海的常茂瑾、杨珠德女士和来自武汉的闵稻苏、闫晨丽女士声称，她们曾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，现要求被告发表官方道歉声明并承担经济赔偿。

我感到我的胃在痛苦地收缩。他们在这里把我们称为“慰安妇”，反反复复，一遍又一遍。这是怎样的耻辱，怎样的亵渎，慰安妇！为什么要如此称呼我们！那时没有人是需要被安慰的，只有我们，我们！被奸污、被迫成为妓女、成为奴隶的我们！我们那时还只是孩子，是无辜的孩子啊！

我闭上了眼睛。

美安的故事：童年的小鸟飞走了

我出生于1924年，那时正值夏天。我家在中国南方，那个小村庄坐落在浙江省南部，被称作“大叫的公鸡”，离它最近的大城市是杭州，大运河的终点。我们村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，以种植水稻或养蚕为生。我的父母与他们的父辈、祖辈们都是农民，我相信他们一样是在此地土生土长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。我父母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，那时我的祖父母供不起。他们也是穷人，依赖子女的帮助，为了生存，需要家里每一只手的劳动。种植水稻是大人们唯一能教给孩子的东西。尽管祖母为她的子女不能上学而感到伤心，却从不轻易表露出来。她说，一个女孩子只要能照顾好父母，操持家务，以后最好嫁个富裕的农户，再与之生儿育女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从父系的方面来说，我祖父也认为教育不太重要，奉养父母，好好干活，才是儿子应尽的义务。

我母亲是个很美丽的女人，长发乌黑闪亮，光彩夺目。为了不干扰繁重的劳作，她总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髻，下地干活的大多数时间都穿着海蓝色裤子和黑色衬衣。她的年纪越来越大，背也愈显弯曲。她扛在肩上的担子，那一个一个装满稻子或者盛满水的桶，对

她瘦削的脊背而言实在是太过沉重的负担。可她别无选择，必须苦劳作来养育我们。即便生活艰辛，我母亲仍然保持着姣好的面容，皮肤像丝绸般光滑，大眼睛，瞳仁深邃，再加上她的高颧骨，完全符合那个时候人们理想中美的典范。她说起话来轻声细语，从不对谁大声嚷嚷。我一心想要变成她的模样，发自内心地钦佩她。母亲是我最大的榜样。

我父亲身高一米八，人高马大。周围没有谁像他这么高，他因此很受其他人尊敬。他不如我母亲好看，长着宽鼻子和干瘪的嘴唇。人们能从我母亲的目光中认出善良和她的热心肠，而我父亲的眼睛则黯淡无光，不会泄露任何一点他的本性。他也深受背部疼痛的煎熬，与我母亲一样，生活全被劳作填满了。晚上他经常和朋友们在村里坐坐，一起抽烟喝酒，在这一点上我母亲没有说过他什么，不过我倒是时常心想，他本该多帮帮母亲的。我母亲从不指责他不在家，显然，她甘心忍受，而且觉得父亲不过是一时如此，男人本来就是这样子。父亲有时很暴躁，跟母亲截然相反。他会对我们咆哮，愤怒地挥舞着胳膊，做出夸张的手势，眼睛暴突在涨得通红的脸上，以至于还是孩童的我一直很害怕那对眼睛会不会突然就掉出来。父亲当然是爱我们的，但他并没有多少耐心留给孩子，他更愿意在一份独处的宁静里抽抽烟。他有时候喝得烂醉，摇摇晃晃地回到家，冲我们野蛮地大吼大叫，还训斥我母亲。而母亲则放任他堕落的样子，也不去制止他嘴里骂骂咧咧的责备，无论那些话是

多么的不可理喻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彼此深爱对方。他们就是注定要生活在一起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我父母和村里的多数人一样靠种水稻维持生活。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辛苦，唯有种稻人自己明白。我们只种湿水稻。在山上开垦梯田，人工灌溉之后再按均匀的间距插上秧苗。水稻是圆锥花序，依不同品种在水中分别生长三到九个月。过了开花期，梯田的堤坝会被打开，让水流走。一旦水稻成熟，收获就开始了，收好的稻子散布在阳光下面加工晒干。等稻子足够干了就要打谷，让谷粒从穗里脱出。那时候我们没有机器，完成这项吃力的劳动仅仅靠肌肉的力量。从小我们就站在水里种稻。如果天降好运，恰逢适宜作物生长的好时节，我们一年甚至能高高兴兴地获得超过两次丰收。然而，好运不是时常能碰上的。如果遭遇久旱，颗粒无收，所有付出的心血都会化为徒劳，这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。所幸村子里的庄稼人们一直彼此相助，我们家不至于沦落到真正闹饥荒的地步。尽管很少有肉吃，我们却没挨过饿，天天吃米饭，觉得有米饭已经足够了。若是因为气候恶劣，没有收成，吃不上大米就吃些蔬菜。我们几个邻居是种菜的农户，另几个经营养猪。逢水稻收成不好的年份，邻居们便用蔬菜和猪肉来接济我们。我们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关系都不错，他们善良且乐于助人。可是还存在着一些人，自我幼时起就傲慢过人，我尽量避开他们。“对你身边的人要以尊重相待，”父亲总是这样跟我说。但我不懂，为什么对那些看不起我们

家的人我也要报以尊重，就好像我们欠了他的情一样。

我和两个手足一起成长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我哥哥行甫 1922 年出生，比我大两岁。妹妹筱芙 1927 年出生，比我小三岁。哥哥长得很像父亲，也是又高又瘦。我那甜甜的妹妹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。我喜欢给筱芙梳头，给她编辫子，和她一起玩耍。我为她带来许许多多的欢笑，她的笑声在我听来宛如音乐。我深爱我的哥哥和妹妹。虽然生活拮据，一贫如洗，甚至有时无以果腹，因为拥有彼此，我们也还是幸福的。父亲母亲给予我们爱、生命，给予我们理解和包容，我无法想象有一天我要与这个家分离。

我们不知道，1931 年日本侵略了中国北方的满洲里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为“满洲国”的傀儡国家。那只是日本在中国一连串漫长征战的开始。在我们这里，人们继续着自己的劳动，发生在遥远北方的一系列事件好似与南方的我们没有关联，也不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满洲里实在是个太远的地方，我生活在我的童年里，没有敌人，没有战争。

我过完六岁生日后不久就应该和哥哥行甫一起去学校念书了。然而上学是件很昂贵的事情，对有我们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太过昂贵了。所以父母决定让我和哥哥在家教筱芙。我相信筱芙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伤心的，因为她不被允许去上学。但她从不抱怨，她知道这是钱的缘故，她应当知足。我和行甫喜欢去上学，每趟往返学校的路途对我们都已然是一件大事。我们不得不在梯田里爬上爬

下，跃过湿漉漉的大石头，踩着河中唯一平坦的地方涉水而过。我们每人只有一双鞋，无论严冬酷暑都得踏着仅有的一双鞋走过。夏天我们在河里玩耍。浙江南部的冬天寒冷却短暂，罕有下雪。夏天是亚热带式的漫长，非常炎热和潮湿。

每晚入睡时分，母亲都会在前为我们唱一支美好的谣曲。我最喜欢的那首唱的是一只寻找父母的小鸟：

我是一只小小的鸟，

刚刚孵化到世界。

很快我学会了飞翔，

飞过高山和亭台。

我是一只好奇的鸟

我爱大自然。

恐惧？不安？

不留丝毫在心间！

于是我掠过宝塔，

又飞越湖海。

我有骄傲的勇气，

危险？我通通忽略！

而有一天我飞回家，

发现父母不见踪影。

我经历了飞翔，

他们也早已迁徙。

失去心中所爱，

我怎能生存？

我需要他们的爱，

我要他们的温暖，

缺少他们的慈爱，

丢失温暖的巢穴，

痛苦是仅存的感觉。

现在我这只小小的鸟

带着我破碎的心。

妈妈第一次唱起那首关于小鸟的歌时，我确信我哭了。我对小鸟有一种同情。我幻想它在我眼前飞翔，我感觉得到它正在遭受的痛苦。我一直希望故事能有个好结局，鸟儿最终找到了它的父母。可它做不到。

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特别的高潮和低谷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去上学，父母去田间，日落后一家人吃顿朴素的晚饭，坐在一起聊聊天。

唯有到了节日的时候才能打打牙祭，吃到丰盛的大餐。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，始于传统农历正月第一个新月那天。对于农人们和其他劳作的人来说，这是一年里仅有的一段真正从无休止的劳动里解脱的日子。母亲说，城里过年要庆祝三天，我们农村就更长

了。过春节的时候家人团聚，礼尚往来。为了置办些吃食，父母破例要去一趟城里。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想跟着去，父母却不准。母亲总是念叨，小孩子到大城市里去太危险。

我们没有礼物。但爸爸妈妈一整天不用外出劳作，三餐都能同在桌边与我们分享，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连平日素来对我们缺乏耐心的父亲也在过节时笑得更多了，甚至和我们一起玩闹。大多数时候我们要在春节吃鱼，一整条摆上桌面，象征年年有余。许多年轻人趁着此时成婚，在良辰吉日为婚姻讨个好的彩头。母亲在门上装饰好红色的春联，写上新年愿望和其他的祝福。菜都要在前一天准备好，因为据说春节当天劳动会带来厄运，做饭当然也算劳动。美好的饭菜香弥漫在整个房子里，我们的口水开始在嘴里打转。所有新鲜的食材，鲜嫩多汁的桃子，芳香扑鼻的香料，填充着许多特殊配菜的鲜美的鱼，我们的这顿饭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气息。桌上少不了的还有父亲最爱喝的茅台酒。那是种很独特的烈酒，用小麦和高粱配以高浓度的酒精酿制而成。平时母亲嫌它碍眼，但过节的时候一切都另当别论了。那天父亲也不允许我们手里拿刀具或者剪刀，因为那同样会带来厄运，它意味着把运气都剪掉了。我那么爱我的父母，我想一直当孩子，永远不结婚，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家。

法庭上

和平抓着我的手，也许这样她会觉得好一点。她是我的支柱。一切都进行得很迅速，审理已经完全进入程序了，可翻译说的话我还没听懂多少。我们的名字被反复提到，我的就有两次。我将要作为第一个证人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法官面前的证人席的。一位日本律师站起来，开始询问我。

“请问您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？”

“1924年8月，我出生在浙江省一个名为‘大叫的公鸡’的村子。现在我七十三岁了。”

“您现在的居住地在哪里？”

“我住在南京，上海路10号。”

“您的职业是什么？”

“我在百货市场做售货员。”

“您当时是怎么到所谓的‘慰安所’去的？”

现在才是真的开始，我想。现在我必须要警惕起来！我们已经和高教授练习过了。他说，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好答案。他们将试图

像绳索一般纠缠我们。而今我已垂老，我的记忆力也不太好了，但那时的事仍历历在目。

恍如就发生在昨天……